

盛宣怀与武昌起义的“蝴蝶效应”

文 / 张 实

盛宣怀引爆了四川保路运动；四川保路运动引爆了武昌起义。

宣统二年十二月初六，盛宣怀被清廷任命为邮传部尚书。宣统三年，是为辛亥年（1911年）。四月清廷改制，“皇族内阁”成立，盛宣怀留任邮传大臣，亦为阁员大臣。立志要做大官、办大事的盛宣怀登上了他的仕途顶峰。

晚清铁路政策的演变

补授邮传部尚书命下之日，盛宣怀在谢恩折中说，“……凡本部缺憾之端，皆微臣疚心之事。臣于路电轮船均经手创办，但今昔情形迥不相同，自非不避嫌怨，力任巨艰，恐难振全部之精神，冀交通之尽利。”言词之间，有一股“舍我其谁”的霸气和“豁出去了”的劲头。

此时，他已兼任轮船招商局董事会主席，正式夺回了对它的控制权，汉冶萍公司向日本贷款正在抓紧进行，将各省官办电报收归邮传部管理之后，便大刀阔斧地把铁路问题推上了重大议事日程。



盛宣怀

晚清的铁路政策，从官办到商办再到收归国有，有一个演变的过程。

1904年，为争夺我国东北地区控制权的日俄战争在旅顺爆发，再一次燃起了国人的忧患意识和要求变革的激情，立宪运动勃然兴起，一个收回利权的思潮席卷中华大地。收回利权首先是收回被列强攫取的铁路、矿山，从1905年四川绅商创办川汉铁路有限公司起，到1906年进入高潮，先后有十余省办起了民营铁路公司，收回粤汉、沪宁、苏甬杭、广九等铁路的修筑权，招股集资自办。但是，此时的民族

资本尚不具有大规模兴建铁路的经济实力，加之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腐败习气，几年下来，商办铁路进展缓慢、成效甚微，不仅是资金难筹、人才短缺，而且管理不善，出现了严重的贪污、挪用和浪费。各地自行其是，难以统一规划、协调衔接。

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，一道上谕下到邮传部，指责商办铁路公司“奏办有年，多无起色，坐失大利，尤碍交通”，令邮传部派员勘查，对于不能按期完工的“即由该部会同该管督抚，另筹办理”，表明曾经同意铁路商办的朝廷开始转了风向。1909年11月23日《民立报》《南浔路生机绝》报道，铁路将“收入部办”，“将来各省商办之路，均须次第归并，特借赣路以树先声”。此时盛宣怀任邮传部右侍郎，铁路国有政策的出台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。1911年2月18日，新晋升为尚书的盛宣怀断然向四国银行代表表态：“川汉等路，不欲筑造则已，苟欲全工告竣，则非借外债不可。”明确无误地为借债修路定下了调子。



清朝末年的铁路

盛宣怀推行铁路干路国有，不能说它没有一定的合理性，当时商办铁路确实较普遍存在资金不足等一些弊端，亟待改变；中国领土辽阔，建设铁路必须由国家统筹全局、加强管理；盛在日本考察，了解到日本人实行铁路国有，成效显著，值得学习；这些也都是导致盛推行铁路国有的实际因素。但是，还有一个显而易见而又不可忽略的个人因素：此时坐在邮传部尚书金交椅上的盛宣怀，实现铁路国有，就是实现盛宣怀对全国铁路的重新垄断，重温当年被人剥夺的壮志和辉煌。

当时推行铁路国有存在两个不可避免的矛盾。一是国家并无资金，仍然是借外债，必然要给列强让利，这就与此前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收回权利的浪潮逆向而行。百年来，许多学者认为“所谓收路国有的实质就是出卖路权”。二是推行铁路国有，与各地商办铁路公司处在对立的地位。而后者汇集着各地的精英，

如苏路张謇，浙路汤寿潜，川路蒲殿俊、张澜、罗纶、邓孝可等。这些人既是有过功名的在籍官员，又是创办新兴企业的领头人；既是全国立宪派的代表人物，又是各地咨议会的首领。在商办铁路公司林立，反对借洋债、保路权的呼声遍及全国的背后，民族资产阶级正在迅速发展壮大。这一新兴群体不仅在经济上求发展，而且在政治上争地位，在思想上正在发挥重大影响。

盛宣怀引爆四川保路运动

遗憾的是，盛宣怀既未认清也不能适应这种时代趋势，不是采取措施化解矛盾，而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，激化了这些矛盾。

实施如此阻力极为强大、经济利益牵涉面极为广泛的重大政策转变，盛宣怀凭借的是执政合法性极度衰减、执政能力和威信极度低落的载沣专制政权的权力，利用这个衰朽的末代王朝所赋予他的行政职能，强制性的推行。在具体操作上，不适宜做法

导致矛盾激化。

首先是急于求成，一意孤行，投机取巧，陷入孤立。

宣统三年四月六日，给事中石长信上奏，要求明定干路为国，揭开了国家铁路政策重大变更的序幕。随即盛宣怀上奏《复陈铁路明定干路支路办法折》，请皇上明降谕旨晓示天下。

四月十一日，朝廷诏命天下铁路干路均归国有，定为政策，要求“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”。

四月十二日，邮传部、度支部电湖广、两广、四川三总督，尽速与各所在省铁路公司洽商，接办川汉、粤汉铁路。四月十六日，朝廷命端方为督办粤汉、川汉铁路大臣。

四月廿二日，盛宣怀与英、德、美、法四国银行团订立合同，借六百万镑。同日，请旨签字盖印，钦奉谕旨：“著邮传部大臣签字，余依议。”

从石长信上奏至订立借款合同，总共只有半个月的时间。表面看来，紧锣密鼓，进展神速；实则是暗藏着盛宣怀的小算盘，利用此时撤销军机处与成立内阁两者职权衔接的空档，赶在资政院全国大会召开之前，将此决定发布，使之木已成舟。当时朝廷内部以及朝野之间，原本难以就此形成共识，盛宣怀采取手腕掩盖矛盾、压制不同意见，终于是纸里包不住火，反而留下了无数隐患，旋即一一发作。

收路命下达之日即引起强烈反对。5月24日《大公报》称，“湘

省人民极为反对，现今开会议决抗拒，群情汹汹”，“粤省绅商大动公愤，纷筹对待之法，已决定一面奏劾大臣盛宣怀，一面质问总协理大臣”。由于盛宣怀事先未与督抚们沟通协调一致，湘抚杨文鼎、护理川督王人文都一再提出不同意见，为本省绅商说话；盛宣怀有意趁总理奕劻、协理那桐、徐世昌尚未在内阁就职之际自己直接上奏，奕劻等人也就乐得看着他成为众矢之的。由于赶在资政院开会之前出台，刻意避开民意机关的审议，议员们的愤怒积压在武昌起义后如火山爆发，要求严惩罪魁祸首，盛宣怀终于招致了灭顶之灾。

有的学者对铁路国有政策持肯定意见，指出失败原因是清政府没有把相关铁路事宜交与咨议局，没有遵守《公司律》。从当时的情势来看，苏浙川的商办铁路公司总理，如张謇、汤寿潜、蒲殿俊本身便是各省咨议局的首领，资政院内各省议员大多是本省铁路公司的重要成员和大股东，资政院不啻是反对借款修路的大本营，铁路收归国有的方案必然会在资政院遭到激烈的反对。

其次是在摊还股本上与民争利，激发了川民的强烈不满

收四省之路，为何独独四川保路最为激烈？一般都认为与盛氏采取的所谓“区别对待”的政策有关。

铁路收归国有的关键是如何返还股本。据《遵筹川粤汉干路收回办法折》，因为四省情况各有不同，盛宣怀制定政策的原则

是“大约以商股与公捐不同，实用与虚糜又不同，故不得不稍示区别，或还现款，可给保利股票，或给无利股票，分作三项办法。”四川与粤湘鄂三省不同者，一是以“租股为大宗”，按“收租在十石以上者，均一律照抽”，实际上各县都是随粮摊派，几乎全川人民都有川汉铁路的股份。二是铁路资金被管理人员私存钱庄倒账损失近三百万两。

如此，四川的租股既不能如湘、鄂的商股一样照本发还，其中三百多万倒款又要四川人民自负其责，便成为归还股款的症结。在川人看来便是“优于湘粤，独薄于四川”，所谓“股款宜由部接收”“已集之款入作公债”实为强夺民财，“邮传部侮辱川人甚”。五月十七日，盛宣怀所签订的粤汉、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寄到四川，举凡筑路中会计、监督、用人、购料以及路成后的管理等主权均有丧失，更激起川民的极大愤怒，数千人于五月廿一日集会，声讨盛宣怀卖路，成立“四川保路同志会”。川人本来主要是争取发还路款，保路是为保款，继而保款无望，激而坚决保路。

南方的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，希望化解这个僵局，对盛或当面进言，或写信忠告。张謇于五月中旬进京，在摄政召见时谈到“四川铁路收归国有，须宽恤民隐”。随即载泽约盛宣怀与张謇共同商议，张认为川路所亏的三百多万“输出者川之人民，亏挪者川之绅士，当然一面查追绅士，一面允给川人”。但盛宣

怀仍然强调“川绅所亏者三百余万，政府不应受此亏数”，一再坚持要从中扣出，最后不欢而散。

最后是始终采取强硬手段，力主镇压，致使矛盾激化而不可收拾。

五月二十一日，清廷批准盛宣怀拟定的川粤汉铁路收回办法，上谕结尾说：“经此次规定后，倘有不逞之徒，仍藉路事为名，希图煽惑，滋生事端，应由该督抚严拿首要，尽法惩办，毋稍宽徇，以保治安。”字里行间，已是杀气腾腾。据6月26日《申报》《邮传大臣之压制手段》一文揭发，盛宣怀拟旨时本来写的是“一体严拿，就地正法”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不同意铁路国有，抓来不分青红皂白，就要杀头。连徐世昌都看不过去，对载沣说了话，才由徐执笔删去那八个字，改成后来下发的文字。

护理川督王人文压制不力被撤换后，七月初三盛宣怀致电新任川督赵尔丰：“要胁罢市、罢课即是乱党。湘、粤初亦如此，经告示严禁，有‘格杀勿论’字样，乃能相安无事……罢市、罢课倡首数人，一经严拿惩办，自可息事宁人。”与此同时，盛宣怀致函内阁总理大臣奕劻，转述端方和湖广总督瑞澂力主严惩的电报，强调“为今之计，惟有商之内阁，请发严旨，责成川督切实劝告，不听则强制执行，严拿为首倡议及从中鼓煽之人，惩办一二，或可渐戢嚣张。”“其如川省一变，粤、湘必从而附和，民气愈嚣，主权必从此沦替，此

兰台情

文 / 周 钢

1994年盛夏的一天，一封来自湖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寄到我当时就读的高中——武汉三中，当我拆开这封录取通知书时，“档案学专业”这五个字映入我的眼帘。从此，我与“档案”有了不解之缘。“档案”成为我学习、工作、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。

求学时：象牙塔里 “学档案”

1994年9月至1998年6月，我和班上其他27位同学一同在沙湖旁求学四年，初识“档案学专业”的魅力。在校期间，同窗28人系统学习了档案管理学、档案保护技术学、档案文献编纂学、声像档案管理、图书档案分类法、

档案法规学、外国档案工作概论、档案统计学、缩微复制技术、计算机辅助档案管理等20多门专业课程，校园内的教室、图书馆、自习室里留下了我们莘莘学子求学、求知的身影，我们在“档案学专业”的知识海洋里遨游。覃兆别、周耀林、吴成国、任汉中、朱建贞、王艳明、付正刚、熊志云、雷春蓉等恩师的授课场景至今历历在目。记得覃兆别老师在课堂上，神采飞扬地说自己在档案学学术期刊上发了多少篇文章时，令座位上的我们无不钦佩。多年过去了，我对当时老师讲授的专业知识大多已记不太全，但对“兰台”“Archive”这一“档案”中英文称谓以及“起居注”“谱牒档案”等专业名词却仍记忆犹

新。大学四年级时，根据学校统一安排，我与其他几位同学一同到武昌区档案馆实习，帮助整理馆里的部分文书档案，迈出了学习档案学专业从理论到实践的第一步。可以说，档案学专业引领我的人生路，通过四年的档案学专业的知识积累，使我初步掌握了档案学基础理论知识，为今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入职后：人事库房里 “整档案”

大学毕业时，我有幸到湖北日报社从事干部档案管理工作。刚入职时，报社当时有干部档案400多本，保藏于人事库房之中。在报社人事部老同事的带领下，我从干部档案分为“十大类”学

实关系大局，非仅路政隳败，恐内政外交一切均无从下手也。”他这里着力维护的“主权”，与“民气”相对立，是指君主独断专行的专制之权。当时的舆论如《民主报》便痛责盛宣怀“凶猜险狠，对于川路风潮，竭力主张压制”。

压力愈大，反抗愈烈。川人

由保款而成立保路同志会、罢市抗粮、为首之人被逮捕、民众情愿遭枪杀，从而使同志军遍地并围攻成都。盛宣怀更策划调动湖北新军入川镇压，于是武昌起义爆发。

10月25日，资政院会议一致要求严惩盛宣怀，呼吁“诛盛

宣怀以谢天下！”26日盛宣怀被“革职永不叙用”。28日在五国外交使团庇护下逃离北京。

（作者曾任湖北省黄石市文联主席，现为湖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，汉冶萍研究中心研究员，著有《苍凉的背影——张之洞与中国钢铁工业》等。）

责任编辑：黄 敏